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人民日报出版社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2 字数43,000

1978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200,000

统一书号3132·005 定价：0.13元

目 录

- (一) 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杨易辰 (1)
- (二) 名与实之间
——从“盗泉”谈起……………若水 (10)
-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18)
- (四) 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任仲夷 (31)
- (五) 漫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 (41)
- (六) 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的检验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 (47)
- (七) 科学和迷信……………李洪林 (56)

拨乱反正 必须解放思想

杨易辰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黑龙江省揭批查运动取得很大成绩，正健康地向前发展；这场伟大的革命推动了各项工作。全省人民都为已经取得的胜利感到高兴。越是形势大好，越要牢记华主席最近的指示：千万不要“稍有一点进步，就表现出一种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危险态度。”在当前，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我们决不可以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估计过低而放松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件大事。

不能不看到，同大好形势不相适应的是，现在有些领导干部还心有余悸，消极地总结所谓历史经验，在原则问题面前模棱两可，左顾右盼，这也不敢抓，那也不敢动，正确的不敢坚持，错误的不敢纠正，甚至还在那里抱怨“理论难学”、“路线难分”、“上当难免”。这样的思想、精神状态是错误的，如不彻底改变，就会跟不上新长征的步伐。这就告诉我们，要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加快四个现代化的速度，工作上有一个大的突破，就必须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继续拨乱反正，进一步解放思想。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连续发了揭

露“四人帮”罪行的三批材料，现正率领全国人民打第三战役，使我们的思想不断得到解放。但是，要彻底砸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事实告诉我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是一场深刻的斗争，是会不断遇到阻力的。最近，我们重温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学习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五届人大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对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发现在一部分群众、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还有几怕，如：在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怕被说成是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总结二十八年的经验教训，怕被说成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深入揭批“四人帮”联系批林彪路线，怕被说成是纠缠历史旧账，等等。这实际上是林彪、“四人帮”颠倒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颠倒路线是非的流毒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妨碍人们思想解放的，必须加以澄清。

（一）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一伙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究竟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还是反对毛主席伟大旗帜？

林彪、“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披着马列外衣的反革命集团。他们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打着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反对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在如何对待革命理论的问题上，他们制造了种种谬论，其中影响最坏、流毒最广、危害最大的：一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

一万句”，并由此任意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片言只语吓唬群众；二是鼓吹“绝对权威”和“顶峰”，并由此给反对他们的人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不允许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林彪、“四人帮”被人民打倒了，他们的这些谬论的流毒还远未肃清。因此，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根本问题，就是拨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之乱，正毛泽东思想体系之本。

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不把林彪、“四人帮”散布的这些谬论批深批透，就不能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是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还是“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对它的每个原理，都必须历史地考察，在考察这一原理时，必须同它的其他原理联系起来，同具体的经验联系起来，才能准确地理解它，正确地运用它。毛主席历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这已经成为我们党的优良学风。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说过：“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一类政治骗子鼓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事实上他们半句也不听。这就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的卑劣手法和阴险目的。毛主席对林彪、“四人帮”一贯摘取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的批判，对于我们坚持搞马克思主义、识别修正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至今有些同志没有勇气去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况，而是遇到问题绕着走，对上级的指示、文件只是照抄照转，当“收发室”，工作毫无生气。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理论、路线、方针要不要在实践中具体化并受实践的检验，要不要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因为它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是因为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并用来指导实践的。因此，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根本原则。不然，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以农业发展为例，毛主席提出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是科学地总结了农业发展的规律，是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就黑龙江省来说，各地情况不一，有林区，有牧区，有产粮区。在确定一个地区的生产方针时，有的就要以林为主、农林结合；有的就要以牧为主、农牧结合。事实证明，林区把林业搞上去了，牧区把牧业搞上去了，反过来，就推动了粮食生产的发展；粮食生产上去了，又保证了林业、牧业的大发展。这样，不仅没有违反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而恰恰是很好地体现了这个方针。

实践是在不断发展的，理论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如果理论停滞了，不再发展了，也就不可能指导实践。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我们必须适应新的需要，认真研究这些新问题。只有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中去，投身到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去，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并由实践来检验，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

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过去是、今后永远是我们团结战斗的旗帜。林彪、“四人帮”肆意篡改毛泽东思想，打着“高举”的旗帜，贩卖他们的黑货，我们不少人上过当、受过骗。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高举毛主席旗帜，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是地地道道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糟蹋毛主席旗帜的。

(二) 实事求是地总结二十八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究竟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林彪、“四人帮”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把十七年的一切都看成是黑的，谁要说个“不”字，就是“复辟回潮”。他们又把文化大革命以后十一年的一切都说成是红的，不许批判他们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谁要说个“不”字，就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林彪、“四人帮”的这种流毒和影响，至今还使有些人心有余悸，这也不敢说，那也不敢做。林彪、“四人帮”一伙最怕实事求是，最怕讲唯物论、辩证法。建国二十八年来，尽管有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破坏，但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对十七年和十一年都要一分为二，对哪一段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因而也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只有肯定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承认林彪、“四人帮”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进行干扰破坏，许多重大问题的路线是非才能分清。例如，过去我省只要谁说一句“原省委”，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是“复旧”、“复辟”、“翻文化

大革命的案”，只能违心地说“黑省委”、“旧省委”。最近，我们根据党中央对欧阳钦同志的评价，明确地肯定了欧阳钦同志主持下的原省委，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红的，而不是黑的，虽然也有缺点错误，但这并不是主流而是支流。这样实事求是的评价，得到了群众的欢呼和拥护，它使多年来压在党员、干部和群众身上的石头搬掉了，思想解放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路线是非等问题，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搞“全面内战”、“打倒一切”所造成的危害，在我党历史上是罕见的。“四人帮”挥舞大棒，不许人们议论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任何问题，就是要肯定他们自己，树他们自己，保他们自己，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谁怀疑、反对他们，他们就给谁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搞复辟的帽子。因此，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消除他们在各方面所造成的恶果，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正是为了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否认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揭批“四人帮”联系批林彪路线，究竟是拨乱反正，还是纠缠历史旧账？

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提出：揭批“四人帮”联系批林彪路线，这是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的一个重大步骤。根据这个部署，我们提出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联系揭批林彪路线，在继续搞好清查的同时，把运动的重点放在查危害，肃流毒，治内伤，解决本地

区、本部门、本单位的问题上。运动一深入，在一些领导干部中间出现了“怕纠缠历史旧账，问题复杂难解决”等顾虑。他们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揭开盖子，运动深入不下去，群众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工作上不去。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个别人是本身不干净，多数人是揭批“四人帮”联系批林彪路线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

林彪和“四人帮”本来就是一伙，他们早就勾结在一起破坏文化大革命。林彪把文化大革命叫做“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和“批判干部的运动”。“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正是这些东西。“四人帮”的“三搞一篡”、假左真右、以帮压党、反军乱军、唯意志论等等，同林彪那一套都是一路货色。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四人帮”怕露出马脚，根本不批林。如果要批，也只批“两头”，不批“中间”。即前头批林的历史问题，后头批林搞反革命武装政变的《“571工程”纪要》，而对林彪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却捂住不批。谁要一提批林彪的极“左”表现，“四人帮”就叫嚷“批到我们头上来了”，不准再批林了。所以批来批去，连林彪路线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不批林、假批孔，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叶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省前省委的那几个主要负责人也是不批林、假批孔的。他们的思想体系就是林彪的思想体系。他们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东西也都是从林彪那里来的。揭批“四人帮”联系批林彪路线，无论在全国还是在我省，都是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顺理成章的，怎么能说是纠缠历史旧账呢？对于已经承认了的属于过去的错误，或者属于个人之间的恩怨旧账，当然是不应该算的。但是对于林彪修

正主义路线这个大账，如果不认真清算，许多坏事找不到祸根，许多有关路线是非的问题就搞不清楚。因此，揭批“四人帮”联系批林彪路线，对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分清是非，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好第三战役，走向大治，具有重大的意义。

事实证明，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又必须有破有立。破，就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通过第三战役的斗争，坚决、彻底地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重重思想“禁区”，揭穿他们假左真右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批判他们的种种谬论。立，就是要向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二十八年的经验学习，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学风，认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适应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必须开展一个持久的学习运动，学理论，学政治，学经济，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必须振奋精神，解放思想，敢于讲话，敢于批判，敢闯难关，把那种愚昧落后和懦夫懒汉的精神状态扫除干净。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让人讲话，切实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有这样，党的生活当中才有唯物论，才有辩证法，才能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可靠的组织保证。否则，象“四人帮”横行时那样“指鹿为马”之风盛行，人们不敢讲话，那里还有什么真理可言！

黑龙江省地处反修前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回顾粉碎“四人帮”以来的胜利进程，展望大好形势的发展，我们对夺取更大的胜利信心百倍。我们正

在做前人未曾做过的伟大事业。在新的征途上，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不曾认识其规律性的必然王国。但是，我们只要满腔热情、生气勃勃地投入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准则，孜孜不倦地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研究和认识客观规律，我们就一定会冲破各种艰难险阻而胜利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坚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抓纲治国，团结战斗，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做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197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名 与 实 之 间

——从“盗泉”谈起

若 水

日本作家长谷川如是闲曾经讲过“盗泉”的故事，说是：“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

这个故事，我是从鲁迅的文章里看到的。据注释者说，不饮盗泉的故事原出于中国的《尸子》，盗泉就在山东，“古之君子”就是孔夫子。我没有去查古书，因为我不想作考证，只是想借用长谷川如是闲这句话来说明一个问题。

渴而饮，本是自然的事。只要水是干净的，就可以喝。但是“君子”却有一个讲究，他要先问泉水的名字。泉水本身也许是好的，可是千不该万不该叫“盗泉”。从“古之君子”的眼光看来，一有了这个名字，这泉水就坏了，不能喝了，特别是“君子”更不能喝。“君子”和“盗”是对立面，怎么能和“盗”字沾边呢？所以他宁肯渴死在泉旁而保留“君子”的名声，也不能喝一口泉水而玷污自己的清白。

如果谁想去说服“古之君子”，对他说：你要喝的是泉水，并不是泉水的名字，“盗泉”的名字固然不好听，可泉水还是好的，如果不信，不妨亲自喝一口试试。这些道理对“古之君子”是不起作用的，因为他是把“名”当作决定“实”的东西。既然这水名叫“盗泉”，那么这水就一定有“盗性”。明

明这名字已经告诉你，为什么还要喝一口试试呢？何况对于具有“盗性”的水，又怎么敢去喝一口呢？名字竟有这么大的魔力，这大概是给泉水取名的人始料不及的吧！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我们也看到这种现象：名字决定一切。他们要打倒一个人，不需要调查什么罪行材料，只消给他戴一顶大帽子；要否定一个东西，也不需要根据实践结果，只消给它取个坏名字。

拿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来说吧，引进这些东西，是加快本国经济建设的好办法，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了的。可是在前些年，这也成了盗泉之水。大庆建设一个采用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化肥厂，江青就说，“那可不行”，“要拆掉”。理由呢？据说那是“帝国主义”的。虽然技术本身和泉水一样，都没有阶级性，而且引进以后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那也不行。谁要主张引进，就给谁扣上一顶帽子：“洋奴”。

还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说明它们的经营管理方法有合乎科学的方面，如果我们原则地学过来，是可以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的。可是，那也有个很难听的名称，叫做“资产阶级管卡压”。你要学吗？你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明明是无损国家主权，又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事，只是由于害怕“卖国”、“投降”一类帽子，就只好照“古之君子”的办法，“恶其名而不饮”了。说得确切一些，是“惧其名而不纳”。

看来，“四人帮”是想把我们都变成“古之君子”。

粉碎“四人帮”，精神得解放。现在，“四人帮”的帽子，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把我们束缚得死死的了。我们赞成鲁迅讲的“拿来主义”，外国的东西要敢于拿过来。我们要问的只

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先进，是不是对无产阶级有用，而不是问“四人帮”给它们取了什么名字。实践已经证明了，引进的效果是好的，我们也并没有因此当“洋奴”，那就用不着怕这样那样的帽子。

然而，“恶其名而不饮”的现象仍然是不少的。

不久以前，报纸上登载了对浙江吴兴县某公社派出的一个农业学大寨工作组的批评。这个工作组把社员自留地上种的四千株桃树说成是什么“资本主义尾巴”，强令统统砍掉。这一下子，每年的损失就是一万多元。究竟这些桃树有什么危害呢？当然也可以说它几条，比如什么和集体生产争肥料、争劳力之类。有这些矛盾是难免的，但只要加强领导，这些矛盾并不难解决。社员不是提出来可以全部卖给国家吗？但仍然不行，非砍不可。其实，说来说去，那些都不是理由，真正的理由还在“四人帮”给起的那个名字：“资本主义尾巴”。桃树何罪？只因为有了这个倒霉的名字，那就要“恶其名而砍之”了。

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名义下，现在有的地方，又是收自留地，又是取消集市贸易，又是禁止家庭副业，闹得鸡飞狗跳。难道真是这些东西给人民带来了多大的实际危害，以致非取消不可吗？不是的，流弊不能说没有，但是好处是主要的，问题只在正确的领导和管理。四川和安徽等地坚决落实党在农村中的经济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很快上去了，资本主义歪风也减少了。反过来，有些地方割掉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取消了正当的集市贸易以后，黑市贸易、投机倒把更猖獗了。为什么不看看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呢？不考虑这些东西在现阶段历

史条件下存在的必要性，不考虑它们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对人民有利，仅仅因为这些东西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就非取消不可，这还是林彪和“四人帮”流毒的表现。

在这些同志眼中，名字好象成了事物的本质，认识了某个事物的名字和这个名字代表的概念，好象就认识了这个事物本身。至于名字是不是符合实际，他们是根本不问的。这和“古之君子”的哲学是一样的。“四人帮”就最希望我们信奉这种哲学，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手中的帽子才能发挥威力，“一戴就灵”。

我怀疑孔夫子真有那么迂腐。大概他渴得并不厉害，还可以装装样子，如果渴急了，他也会有办法的。至少，“今之君子”就比“古之君子”圆通一些，他想起了“正名”的遗训：改个名字不就能喝了吗？比如叫“德泉”或者“君子泉”不是很好吗？于是就可以“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喝下去了。这也真是妙得很！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这水之所以能喝，仅仅是因为改了名字吗？如果一个人初次来到盗泉，无法向别人打听，不知道这泉水是甜是苦，有害无害，仅仅给它改个好听的名字，就放心大喝特喝起来，那也是不保险的。泉水好不好，要喝一口或者化验一下才知道，并不决定于名字。相反，倒是应该先尝过了，化验过了，再给它取名字。如果改一个名字就能改变事物的性质的话，那么试问：反过来把有毒的泉水或臭水沟取名为“圣泉”或“天下第一泉”，你喝不喝？

这种重名不重实的唯心精神，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我们需要的是求实精神，是实事求是。“是”

只能到“实事”中去求，不能到名称、概念中去求。不是“名”决定“实”，而是“名”要符合“实”，而究竟符合不符合实际，也只有在实践中检验。如果只是根据事物的名称来决定对事物的态度，而不问名称是否反映了实际，那就不管是“恶其名而不饮”也好，“改其名而饮之”也好，都是对“名”的迷信。说到底，“今之君子”和“古之君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改名如果是为了符实，那是必要的。比如我们就不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叫做“资本主义尾巴”，而叫做“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这是名副其实的。改名如果是随心所欲，那就成了骗人的手段。“四人帮”就是惯于用这一手的。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了进攻，其中有极少数极右派，公开提出反对“党天下”，甚至叫嚣“杀共产党”。“四人帮”也是极右派，不过他们说：他们要否定的十七年根本不是什么“党天下”，而是“修正主义黑线统治”；他们要打倒的革命干部也根本不是共产党，而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总之是“国民党”。五七年的右派马上就被揪出来了（顺便说一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长期的改造中转变过来了），而“四人帮”却横行了若干年，把许多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迫害致死。这叫“改其名而杀之”。这就是“四人帮”搞极“左”的欺骗性。

春秋战国时期，好些哲学家提出了“名实之乱”的问题。“四人帮”造成的“名实之乱”是历史上空前的。他们把许多好东西扣上坏帽子（如“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右倾”等），要我们“恶其名而弃之”；又把许多坏东西予以好名称（如“社会主义”、“马列主义”、“革命”等等），要我们“爱其名而